

## 引 言

距今七八百年以前，在辽阔富饶的渤海湾西岸，在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附近，一座小小的聚落诞生了。历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流经身边的河水就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她一天天茁壮成长，近百年来终于脱颖而出，她就是近代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当今中国的第三大城市，雄伟、壮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天津。

在我国众多的城市中，天津可以说是既古老而又年轻。说她古老，是因为天津的城市聚落远在 12 世纪初的金代就已经出现，至今已有近 700 年的历史了，至于天津地区的开发，更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前的战国时期。说她年轻，是因为天津摆脱封建城市的躯壳，开始向近代大城市行列迈进，不过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

天津在古代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天津在

近代又是如何迅速发展的呢？天津人民是怎样经过近百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得到了解放的呢？天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又是如何呢？如果你想知道这一切，就让这本书慢慢地告诉你吧！

## 一 大运河与海河哺育 起来的城市

### 1. 天津平原的成陆和早期开发

今日的天津平原，在六七千年以前，还是一片茫茫的浅海，后来随着大自然的几度沧桑变迁，海水渐渐退去，远在 3000 年前的商周时期，一条奔腾咆哮的大河——黄河——挟带着大量泥沙，流经到这里入海。据记载，历史上黄河的入海口有 8 次大的移动，其中 3 次移到天津附近入海。黄河水挟带的泥沙在入海处逐渐淤积成平坦的滩地，也使海岸线逐步向东推进了几十公里。长期以来，人们说天津是“退海之地”。1949 年以后，考古学家在天津附近发掘出不少鲸鱼、海豚的骨骼，和种类繁多的贝壳，这说明，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口碑故事并不是无稽之谈。

黄河的冲积作用，使天津一带成了宜于耕种的平原农垦区，所以到了 2000 年前的战国时期，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天津平原进入了全面开发的阶段。近 30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天津郊区发现 50 多处战国遗址和墓葬。每个遗址几乎都有各式铁制农具，像耨、锄、铲、镰等出土，形状与现在农村使用的非常相似。在南郊的巨葛庄，方圆 10 里的范围内发掘出 9 座聚落遗址，可以想见当时人烟的稠密，真可说是“村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了，你说天津的历史古老不古老呢？

经过战国时期 200 多年的开发，天津平原一天天富庶起来。西汉初年，在这里设置了 5 个县，这就是属于渔阳郡的泉州和雍奴，属于渤海郡的东平舒、章武与文安。其中，现在的天津武清县的城上村，就是当年泉州的遗址，天津宝坻县的秦城是当年雍奴的遗址，天津静海县的钓台村，则是当年东平舒的遗址。

隋朝开通了大运河，把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连接起来，这样便使地处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运输之便的天津一带地位重要起来。所以从唐朝时起，这里开始有了正式名称，这就是“三会海口”，即大运河、海河与渤海交汇的地方。

宋朝没有能够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宋、辽两朝对峙的局面。今天的海河以北属辽，以南属宋，海河成了双方的天然分界线，所以海河在当时被叫做“界河”。宋朝为了防备辽兵南下，在界河以南设置了“寨”、“铺”等军事据点，分兵把守。其中独流、当城、沙窝、小南河、双港、泥沽等寨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 2. 早期的城市聚落——从直沽寨到海津镇

就在宋、辽对峙期间，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强盛起来，建立了金政权。金先灭了辽朝，接着又灭了北宋，统治了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后来金海陵王把首都迁到中都（今北京附近），每年需要把大批粮食由河北、河南、山东用漕船经过运河送到中都。这样地处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便成为金朝漕运的重要枢纽。为保证漕船运输的安全，金朝在武清和柳口派有巡检，又在三岔河口一带建立了直沽寨、设正、副都统，率兵守卫。尽管直沽寨在当时还是个军事据点，但是直沽两个字却成了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正式名称，而

且一直使用到今天。

元朝灭金之后，把中都改为大都，仍然作为首都。为了保障大都的粮食供应，首先想办法恢复了大运河的全线通航，后来又实行了海运。由于通向大都的一段运河经常淤浅，不能行驶漕船，所以漕船由渤海湾进入海河以后，只好先停靠在三岔河口附近的直沽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再换用吃水比较浅的驳船运到大都。这样，直沽成了元朝漕粮中转的枢纽。当时漕船分春、秋两季北上，每次的运输量都有一百七八十万石，差不多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在直沽办理中转接运工作。其间，大量漕船聚集在三岔河口一带。有人见到这种壮观的场面，作诗赞叹说：“晓日三汉口，连樯集万艘”，“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为了储存等待运转的粮食，元朝在直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广通仓和海运仓，在河西务建立了十四仓。为了加强对漕粮的保卫，还在直沽设海津镇和镇抚司，派重兵把守。不久又在大直沽和三岔河口修建了两座天妃宫，以乞求海神对漕船往来的保佑。这时，天津一带的制盐业也发展起来了，在天津附近的渤海湾沿岸一带共设有 22 个盐场，其中“三岔沽”和“丰财”两个盐场就在今日的天津市區之中。伴随着漕运和制盐

的发展，直沽入口不断增加，经济也开始繁荣。河海通津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这就为明朝时期天津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 3 明代的天津卫和清代的天津府

明朝灭元以后，在南京建都，大都改为北平，由燕王朱棣镇守。不久朱棣因和他的侄子朱允炆争夺皇位，率兵从直沽渡河南下。朱棣做了皇帝之后，改年号为永乐。由于这里曾经是天子经过的渡口，所以赐名天津。传说这个渡口就在天津旧城的北门之外，当年这儿曾建有“龙飞渡辟”的牌坊，以示纪念。

永乐初年，明王朝先后在直沽设立了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并在三岔河口的西南修建了卫城。后来明王朝才把首都迁到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卫”是明代的一种军事建置，每卫有驻军 5600 人。在直沽设立三个卫，目的在于保卫首都的安全，以及保证漕粮储存、运输的正常进行。因为每年都有大批漕粮运到天津，所以先在小直沽和卫城以北建立大量屯仓，又在尹儿湾（今天的北仓）建百万仓，在卫城里面建大运仓、大盈仓、广备仓。每年经过天津运往北京的漕粮有五六百万石之

多，为了加强对漕运的管理，天津卫还设立了户部分司。这时的天津已经成为首都的粮食储备基地。

当时在运河上运输漕粮的任务由专门设置的大量运夫承担。为了稳定这些人的生活，官府允许他们用漕船携带一些南北土产往来售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交易一天天活跃。结果大运河成了南北物资交流的渠道，大批漕船成了变相的商队。天津也因为水陆交通便利，成为各地物资的集散中心，南北商家纷至沓来。比如广东、福建的蔗糖、纸张和木材，江苏、浙江的丝绸、布匹与茶叶，江西的瓷器，东北的豆类，都是先集中到天津，再转运到北方各地销售的。

清朝初年，随着天津地方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卫的建置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了，于是把天津卫改成了天津直隶州；不久又升为天津府，管辖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沧州等六县一州。地方管理体制的变更，对于天津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的漕运规模不比明朝小，运夫们携带的南北土产更是一天天增多。后为，清王朝又取消了禁止商人出海贸易的规定，东北的黍、

米和豆类开始从辽东大量转运到天津，天津很快成了华北地区的粮食市场。与此同时，闽粤航线开通，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一带经商的海船纷纷来到天津，其中以广东和福建船队的规模最大，每次要有 200 只左右的大船来到天津，停靠在北门以外的钞关。大量的南北物资、洋广杂货和各地土特产，通过运河与海船，源源来到，各地的商贩也纷纷涌入，大大地促进了天津与江、浙、闽、粤和与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天津作为区域性商业中心的作用一天天明显起来。

明清时期，天津一带的制盐业发展也很快。当时曾经在沧州的长芦镇设立盐运使司，管理附近地区盐的生产和运销，长芦盐从此得名。后来，随着天津城市经济的增长和水、陆运输的发达，盐的生产和销售也越来越兴旺。尤其是日光晒盐技术的应用，不但使盐的产量大大增加，质量也明显提高，产盐区开始向沿海一带发展，天津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海盐集散市场。元明时期形成的海河东岸的煎造区，在清初开始被一望无际的露天储盐仓场所替代。每到产盐季节，大批盐包由沿海的滩田用小船运到天津河东地方，码起一个个巨大的盐垛，堆积如山，一望无际，俗称“盐坨”。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政府的管理机构——盐运使司衙门也在清初由沧州迁到天津。长芦盐的销售，绝大部分由官府承包给世袭的盐商经营，所以在清代天津出现了一批非常富有的大盐商。比如乾隆时期的大盐商查日乾，在天津城西的南运河北岸修建了秀丽幽雅的水西庄，专门招揽有名的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乾隆皇帝到江南巡访的时候，路过天津，四次住在这里，当时园中紫芥花盛开，因而赐名“芥园”。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天津与各地的商品流通的加快，天津的金融业也很快随之发展起来。乾隆年间，山西商人在天津开办的日升昌颜料店首先在国内创办了天津和四川之间的银钱汇兑业务，结果大大便利了商人的贸易活动，日升昌也从中取得了丰厚利润，不久便设立了专门经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此后，其他山西商人也竞相效仿，汇兑业在天津得到迅速发展。

明清时期，由于天津的城市地位和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内的衙署不断增多，以经营盐务、海运和粮食而发家的地方豪富之家日增一日，行商坐贾，不可胜数，运丁车夫，充街塞巷。天津城以东、以北的沿河码头发展成繁

华的商业区，著名的宫南、宫北大街，以及估衣街、锅店街、针市街、茶店口、鱼市、肉市、竹竿巷、洋货街等处，都是非常热闹的市廛。河中船舶往来，陆上车马杂沓，街旁店铺林立，市中熙熙攘攘，天津因此被当时的诗人誉为“小扬州”和“蓟北繁华第一城”。到鸦片战争前夕，天津全县人口达到 40 多万，其中有近 20 万人集中在城内和城外的商业区。天津的地位在当时已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人们评论说：“天津地处各河相汇的要津，可以沟通南北七省舟车。各国进贡的船只，达官显贵出入北京的船只和商贩往来的船只都要在这里停靠，江淮一带的赋税要经过这儿才能运到首都，北方地区所需的鱼、盐要由这儿发送到各地。天津地处众多河流通往渤海的要冲，是首都的重要门户，虽是府属的县城，但如同大都会一样啊！”

#### 4. 西方资本主义的覬觐

就在天津沿着封建城市的道路不断发展的时候，欧洲一些国家却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陆续跨上了资本主义的战车。为了寻找海外市场和开拓殖民地，西方侵略势力开始把注意力移

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当时天津的经济地位和对于首都北京的重要性一天天提高，因而引起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特别注意。他们一直盯着天津，把天津看成是志在必得的猎物。

清王朝建立不久，荷兰首先派出特使哥页和开泽携带给顺治皇帝的大量贡品来到中国，经由天津到达北京，向清政府提出进行贸易的要求，没能如愿，但是繁荣的天津却引起了荷兰人的巨大兴趣。他们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到达了天津卫港口，这个地方被认为是中国最著名的沿海城市，当时中国的主要港口有三个：第一个是广东省的主要城市广州，第二个是南京府的镇江县，第三个是位于顺天府东部边缘地区的天津卫。”天津“周围是 25 尺高的城墙……到处被庙宇所点缀，而且人烟稠密，交易频繁，像这样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因为从中国各地驶向北京的船只必须通过此处，这种条件促进了漕运的异常发展，一艘又一艘的船只接连不断地来到这个城市的面前……在三岔河口耸立着碉堡，高高的城墙上筑有守望塔”。为此，使团的随员还专门绘制了天津和天津附近的地图。

最早阴谋策划占领天津，并以天津为据点再攻占北京的，要数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了。

从清朝初年开始，沙俄便不断向东方扩张，先是吞噬了西伯利亚，继而侵占了外兴安岭以东的大片土地，并且把矛头对准了中国黑龙江地区。只是由于清王朝的坚决抵抗，才暂时遏制了沙俄继续南侵的阴谋。然而，彼得一世以后的沙皇和俄国大臣们仍然不死心，他们拟定了各种侵略中国的方案。1730年（雍正八年），曾经出使过中国并在北京呆了半年之久、还受过雍正皇帝接见的俄国大臣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在给沙皇政府的一份秘密情报中指出，由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道路共有六条，“看来有一条海道——不必怀疑——可以进入中国的著名海港天津；从天津到北京只有70俄里，通过此路难免发生战争，因此需要一支坚强的舰队”。后来的历史证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军舰进攻大沽口，就是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依照这个阴谋，在广州给他们出的主意。

最早提出要开放天津，把天津作为通商口岸的，是当时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对华贸易中，一直占着首要地位。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王朝把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进行，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怎样才能打开清王朝闭锁着的大门，一直

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侧重点，并先后于 1788 年（乾隆五十三年）、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三次派遣使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增开通商口岸。其中第二次派遣的马戛尔尼使团，曾向清王朝明确提出开放天津、宁波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只是由于清王朝的拒绝而未能如愿。因此，也使英国筹谋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行动。

## 二 被迫开放后的成长

### 1. 《北京条约》与天津开埠

1840 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虽然是在以广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的，然而英国侵略者的战略目标，却始终放在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鸦片走私的最大口岸。鸦片贩子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花重金制造新式快船，由广东沿海北上天津，贩卖烟土。当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的时候，一些鸦片贩子又化装到中国北方沿海刺探情报，并且出谋划策说：“天津距北京不过 50 英里，我们在天津所造成的惊恐，大可逼迫满清政府早日结束战争。”1839 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广州施行严厉的禁烟政策，给英国鸦片贩子以迎头痛击之

后，英国舰队立刻遵照政府的指示北上天津。这一招果然奏效，大沽口外的英国炮舰引起了道光皇帝的恐惧感。道光皇帝抵抗外国侵略的态度本来就不那么坚决，这时候完全屈服了，他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林则徐身上，向英国表示要“重治其罪”。从此清王朝在战事中和战不定，以致一败再败，终于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并不满足于他们在《南京条约》中得到的种种特权。鸦片战争结束才几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就写信给香港总督说：要想使中国彻底屈服并不难，只要派遣一支舰队开到天津就可以达到目的。这种要挟手段，比毁灭 20 个沿海或边境上的城市还要有效。此后西方各国纷纷要求修改《南京条约》，加开“天津为通商贸易港口，派领事官驻扎”。1858 年（咸丰八年）英、法两国终于找到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他们占领广州之后便把军舰开到了大沽口，英国公使额尔金公然叫嚣：“只有战舰出现于白河口，才有可能迫使清政府就范。”就在这一年的 5 月 19 日，英法军舰开始闯入大沽口，第二天向南北炮台发起进攻。清朝的文武大员闻声丧

胆，临阵脱逃，英法侵略军沿海河上驶，如入无人之境，于 5 月 26 日闯到天津城外。面对这种状况，天津的大小官吏已经无能为力，只好开城投降。

清王朝得知英法联军到达天津城外的消息非常震惊，赶紧派出钦差大臣驰往天津与英法侵略者谈判。侵略者自以为有恃无恐，将自定的条约逼令清朝的钦差画押，“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清王朝屈服了，分别与英、法两国订立了《天津条约》。尽管《天津条约》使侵略者得到了公使长驻北京，加开商埠，自由传教和获得战争赔款等许多好处，但是没有把天津列为通商口岸。对这一点西方资产阶级非常不满，认为这是额尔金最严重的“失败”，他们极力想修改这一条约，甚至提出“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的侵略方案。

根据协议，清王朝与英法两国应当在第二年互相交换本国批准的条约，于是英法军舰在 1859 年（咸丰九年）6 月 17 日第二次开到大沽口外。清朝官员遵照咸丰皇帝的命令，要求英法两国人员从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可是英法侵略者自恃武力雄厚，狂妄叫嚣：“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并且在 6 月 25 日向大沽炮台发炮